

## 导言：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

宁越敏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进程，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城市化进程。2005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部在其出版的《世界城市化展望》中估计，2008年全世界有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世界由此迈入城市世纪。

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就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城市研究学界相应称之为积极型城市化和消极型城市化。消极型城市化会导致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俗称城市病，主要指住房供应短缺、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以及失业、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

一般认为，伴随经济高速增长，19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2010年，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其人口城市化率达49.68%，较2000年的36.09%提升了13.59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36个百分点。快速城市化推动了我国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加快了我国经济、社会和空间的转型。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城市各项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水平也有显著提升。因此，城市化已和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一起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但过快的城市化也使各种城市问题伴之而生。其中，既有和其他国家相同的城市问题，如社会保障房供应不足、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城市蔓延等，也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问题，如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现象、城市化进程的区域差异等。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速度快、规模大。198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9.39%，远落后于世界平均的城市化水平。到2010年，城市化率达到49.95%，提高了30个百分点，年均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净增4.78亿<sup>①</sup>。如此大规模、快速的城市化现象举世罕见。由于每年有15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进城，政府的第一要务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提供大量非农业就业岗位，以避免出现消极城市化的现象，相应地，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在过去较长时期内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城市建设严重滞后，住宅短缺、交通拥堵、

---

作者简介：宁越敏，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和区域研究中心。

环境污染三大城市问题的表现就已经十分突出。90年代后，通过土地批租等经济手段进行旧城改造，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出现了人口郊区化，以及中心城区再城市化的现象。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程看，城市化、郊区化、再城市化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大都在完成前一个阶段进程后才出现后一个阶段的进程。但我国一些大城市在较短的时间里就从城市化阶段跨越到城市化与郊区化、再城市化并进的阶段。因此，我国的城市化具有明显的“时间压缩”特征，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城市问题在我国同时发生，致使各种城市问题凸现。

(2) 人均资源相对短缺、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均土地、水资源等资源拥有量较低，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快速工业化使生态环境容量承受极大的压力。加之我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承接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结果，大规模的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国家额外增加了我们自己的资源消耗，致使生态足迹赤字愈加明显。同时，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异显著，长期以来人口从乡村向城市、从内地向沿海的流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流向大城市。虽然许多城市问题与城市规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有些城市问题，如交通拥堵在大城市的表现会更严重，这使解决城市问题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3) 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制度建设不到位。虽然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有30多年，但传统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如现行的户口制度不仅使进城农民不能彻底转型为城市人口，出现所谓半城市化现象，一些城市出台的政策甚至限制外地生源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当地的户籍人口。由于政府在地方治理中处于支配地位，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不足，致使一些地方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低收入居民的居住问题、流动人口管理及城中村治理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另一方面，针对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相关制度建设缺失。如为解决城市中低收入者居住问题而提出的社会保障房政策需要三个层面的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城市居民实际收入的核算系统，由此确认保障房覆盖的中低收入者的范围，据此制定保障房建设的规划，包括资金来源、建设规模、选址、配套设施建设等等；二是建设保障房分配的公平、公开、透明的操作系统，以杜绝分配中的腐败现象；三是建设保障房，特别是公租房、廉租房的管理制度，包括租赁者的退出体制、物业管理及房屋维修经费来源等等，以保证房屋的长期使用。但由于上述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加上保障房的建设指标自上而下，致使很多城市出现了非中低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廉租房空置率很高的怪象。其结果是一些地方政府索性取消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或把公租房转为人才公寓，这均偏离了社会保障房建设的本意。

解决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或城市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让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为此，在中央有关文件里一直倡导积极

稳妥推进城市化。针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与城市建设有关的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坚持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原则,科学编制城市规划,健全城镇建设标准,强化规划约束力。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规范新城新区建设,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调整优化建设用地结构,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预防和治理“城市病”<sup>②</sup>。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以中国城市化为主要研究对象。2011年,本人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研究”(11JZD028)。2012年6月30日—7月1日,就快速城市化中的城市问题与治理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与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一起主办了“城市化:动态、问题与治理”国际学术会议。在此基础上,本辑特设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研究专题和城市化和城市体系专题两个栏目,共收入20篇会议论文,内容涉及人口、就业、环境、居住、空间、城市体系等各个方面。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解读了当代国内外城市化过程、问题及治理,在此择其要点,予以评述。

当代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上海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快速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双重影响。尤其是最近的10年里,由于外来人口增长迅速,上海常住人口年均增加60万人以上,和北京一起成为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张凡和宁越敏的文章利用六普数据分析了上海人口增长特征和趋势,指出上海外来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可以用“推—拉”模型予以解释:从“推”的角度看,主要是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导致农村及小城镇人口向上海迁徙。从“拉”的角度看,1992年以来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建设国际大都市进程的不断深入,形成了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来上海寻求个人的发展机会。同时,由于上海本地劳动力结构老化,为大量外来青壮年劳动力进入上海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外来人口已替代户籍人口成为上海主要的劳动力资源。该文还对近十年上海人口空间分布变化做了详细研究。由于城乡接合部是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上海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城市蔓延现象。为控制城市不断向外蔓延,文章认为通过建设新城来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转变,继而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和合理分布是缓解上海人口规模压力的首要途径。

吴瑞君、郑雄飞、曾明星等人的论文指出上海新城人口增长迅速,但主要表现为外来人口的增长,对中心城区人口疏导的作用不明显,而且职居分离现象突出,因此存在着“产城分离”现象。具体表现为:新城产业规划与城市规划及定位不匹配、社会管理模式机制与产业结构和人口素质结构不匹配、资源配置与人口结构不匹配、公共服务空间组合不够等。

为实现“产城分离”到“产城融合”，作者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创新新城开发管理模式，变“区域碎片化管理”为“全市统筹协调管理”，实现管委会由“协调型”向“集中管理型”的转变；创新人口社会管理，立足科学的人口统计规划分类构建多层次的立体产业体系，合理匹配产业和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完善产业、人口等要素的导入和激励机制，促进人口与产业协调发展，推动“产城一体化”。

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由此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者，企业用工的经营战略对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演变、分割具有重要作用。徐伟、杨波和陈真真的文章从企业的用工策略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入手，着重从企业的角度研究企业行为对劳动力市场分割所起的作用。文章以上海劳动力市场为例，重点分析了上海灵活就业的现状与问题，指出性别、户籍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是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由于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固定就业者，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又对从事灵活就业的女性、外来人口等劳动者造成机会的不平等，使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更低。就此而言，只有多视角的城市问题研究才能揭示事情的真相，从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上海是我国最早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城市之一。从1992年起，上海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转为负数，老龄化程度不断上升。2011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达到24.5%，养老问题十分突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居家养老是首选的方式。陈丽梅利用上海市某区六普数据分析了城市老年人的居住条件和居家养老的关系，认为老年人的居住环境存在着住房设施、住房资产、住房可及性和购买力等方面的分异现象，而住房管理的私有化将进一步分化老年人的住房环境。陈丽梅指出中国的居家养老政策发展必须考虑到老年人口的住房总体特征及内部分异特征，着力解决老年人口中的住房拥挤问题、住房可及性问题、无住房资产老年人的社会经济能力问题、高龄老人的住房老旧问题等。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后，许多学者敏锐地看到信息化时代并没有带来一个扁平化的社会。由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人们对信息的利用是不均等的，由此产生“数字鸿沟”现象。外来人口已成为中国城市常住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体部分为农民工，他们进城后能否因居住地的转变消除存在于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现象，而在信息化时代与本地人口处于同等的起跑线上？程红和汪明峰的文章通过在上海城中村的问卷调查考察影响城中村外来人口家庭上网的因素，从一个侧面透视城市外来人口（主要为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城市内部的“数字鸿沟”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外来人口家庭能否上网受个体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类型及全家月收入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农民工进城

相比在农村有更高的收入，但其社会经济地位仍低于户籍人口，这使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并没有随农民工进城而得到很大改善，反而演化为城市内部的“数字鸿沟”。

1980年代初，由于农村实施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但因此产生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急待转移的问题。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小城镇设置标准的改革使小城镇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被认为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但自1990年以来，由于大城市集聚经济效益更为显著，其发展也更为迅速。不过，集聚经济既有正效益，亦有负效益。城市规模越大，产生的城市问题可能也越多。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未来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城。这些人口不可能都向大城市集中，这意味着我国仍然需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实际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是化解城市病的重要举措。浙江省政府提出了小城市培育试点的发展想法，即通过加快已有一定人口规模试点镇的发展，进一步集聚人口，使之发展成为小城市。姚引妹对浙江省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的人口集聚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多数试点镇的人口集聚能力不够。一方面，外来人口迁不进；另一方面，本地人口不想迁。为此，姚引妹提出了未来小城市培育试点镇的人口集聚应以科学规划引导人口集聚，以产业集聚促进人口集聚、以制度创新保障人口集聚、以优质公共服务吸引人口集聚、以文化特色助推人口集聚。

传统上研究城市环境污染问题时，一般只涉及污染的类型及其治理。在全球变暖时代，当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人类发展共识的时候，城市环境问题的研究必然需要从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拓展。谢守红、徐西原的论文就中国城市化和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由于城市是人口、经济的集聚地，一般而言也是碳排放的密集地区。论文采用1985-2009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数据和同期中国碳排放量的测算数据对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量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我国政府已经把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因此，抓好城市节能减排工作是减少碳排放量的重中之重。为此，论文提出从三个方面降低未来的碳排放，即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发展城市低碳产业；发展绿色交通；提倡低碳生活方式。

王永超、王士君、李强的论文以东北为例，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东北是我国老工业基地，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早，相应地也是资源消耗比较严重的地区。论文对东北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东北资源的日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累积效应对于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已成为东北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的首要问题：一方面，东北地区长期以来的资源输出已逐步转变为资源输入；另一方面，原

先的资源主产地大量地转变成资源枯竭型城市，历史欠账问题导致资源型城市快速衰退，面临艰难的转型任务。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其发展教训值得我国其他地方关注，其关键就是如何以创新带动转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一般而言，在无约束的情况下，城市的空间拓展往往采取向外蔓延的形式，这是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城市蔓延可发挥集聚经济效益。然而，当城市规模跨越一定的门槛，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就会面临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这使很多大城市转向多中心的空间发展战略，即在都市区内培育新的空间增长极，以平衡中心城区单极化的趋势。袁淳和孙斌栋的论文从理论上研究了多中心城市的生态绩效问题，认为多中心城市结构在环境友好、人居和谐、能源节约、环境保护和防灾等方面具有积极效应。在环境友好方面，多中心结构对景观格局优化，气候调节、生态赤字缓解可起到积极作用。在人居和谐方面，多中心的城市结构使绿地开敞空间分布更为均衡，有利于形成生态网络，使居民更容易也更乐于亲近绿地。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多中心结构有助于减少通勤，降低能源和污染。在防灾方面，均衡布局的绿地有助于灾民就近疏散。

城市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广泛出现的现象，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出现得早，相应地城市问题出现得也比较早。这些国家在治理城市问题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我们都具有很好的启迪和借鉴意义。为此，本专栏配发了 5 篇论文。

藤田直晴（FUJITA Naoharu）的文章论述了日本的城市问题及其地理学研究，在此予以简要介绍。藤田直晴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把日本的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大都市区的城市化和大都市带的城市化，分别对应于经济增长的国家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在国内）、国际化（产品的生产在国内，销售以国外市场为主）和全球化（生产和市场都以国外为主）这三个时代。作为社会—经济空间过程的城市化在每一个阶段其城市问题有不同的表现。日本的城市化阶段主要发生在 1950 年代到 60 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由于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产生了大城市人口过密、农村人口过疏的现象，面临的主要城市问题就是住宅短缺、质量差，城市公用设施和基础设施供应严重不足，例如当时的东京就有大片地区就被贫民窟所占据。大都市区的城市化主要发生在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中期，也可称之为郊区化的时代。这一时期日本的城市问题主要是交通拥挤、各种环境污染、房地产泡沫等，城市蔓延现象也开始出现，特别是出现了为保护环境抵制化工厂建设的事件。大都市带的城市化发生在 1990 年后，对应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全球城市之一的东京出现了再城市化的现象，中心城区兴建大量的高层办公楼以应对产业转型。但日本的人口增长率下降，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房地产泡沫也开始破灭。在阅读此文后，我们可以发现中日两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

市问题非常相似。但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时间压缩”现象,使发生在日本三个不同阶段的各种城市问题在我国差不多同时显现,这无疑加重了解决城市问题的难度。

戴二彪和李燕就日本城市的公共住房政策进行了研究。1950年代日本的快速城市化与收入水准的上升加剧了城市住房供需矛盾。如何确保住房供给数量的增长,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成为当时及其以后20多年日本住房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政府采取了用政府资金建设公共住房为主导的住房政策,包括为中等以上收入家庭提供长期低息房贷的“住宅金融公库”的政策、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公营住宅”(廉租公房)的政策和为大都市中等收入家庭建设以公寓为主体的“公团住宅”的政策。作者指出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改善了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然而,这些政策在运作几十年后其弊端逐渐显现,多年来积累的各种问题甚至使日本国民对公共住房政策产生“是否弊大于利”的怀疑,最终导致2000年以来日本政府对公共住房政策进行了大幅度改革。

无独有偶,朱明对巴黎城郊问题的分析一文也涉及法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房建设问题。为应对巴黎大区人口的快速增长,法国政府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二十年间为新移民建设了大量的社会保障房。然而,受当时流行的城市功能分区理论影响,大型住宅区往往建在价格低廉的郊区土地,与就业地相隔较远,而且附近的交通、教育、公共基础设施都难能跟上,增加了生活的不便。特别是住在这些住宅区里的新移民中有不少来自北非及南欧国家,因而批评者认为这种规划制造了社会隔离现象。2005年,巴黎郊区爆发了外国移民第二代因身份认同差异引发的骚乱,而在法国这一多元文化的国家之所以产生移民后代身份认同危机与他们长期居住在主流社会相隔离的空间不无关系。公共住房政策本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福利社会的一项举措,然而在一定条件下,解决城市问题的政策可能引发新的城市问题,日本、法国在城市公共住房政策实施后出现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另外,朱明的论文还分析了巴黎市和郊区关系的演变,其中法国特有的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市镇群共同体的做法值得我们关注。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征就是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由此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权力下放也激发了地方政府间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竞争。法国地方政府间的治理方式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石崧的论文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论述了世界城市破解城市问题的规划探索。现代城市规划起于英国。这是因为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开始城市化进程的国家。19世纪英国的城市化带来城市的迅速发展,但同时城市病的表现也十分明显。1848年和1890年,为解决日趋恶劣的环境卫生问题和工人住房问题,英国先后通过了《公共卫生法》和《工人阶级住宅法》,为现代城市规划法规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框架。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政府介入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在应对各种城市问题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英美开始盛行，客观上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作用日益明显。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三大世界城市，即纽约、伦敦、东京应对危机推出了新的规划战略，这对我国一些以世界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城市制定未来的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现代城市已成为一个庞大的运营系统，其管理涉及方方面面。为应对和处理快速城市化中的诸多问题，我国许多城市设立了相应的城市管理部门，但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其行政执法却面临诸多的批评和压力，在实际执法过程中甚至引发尖锐的冲突。李振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进行了国内城市间和中外（地区）城市间的比较研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城管行政执法体制的经验对完善我国城管行政执法体制不无裨益。

季增民长期致力于中国发达地区大都市边缘地区城市化过程的研究，在“*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for Researching Chinese Urban Fringe Areas*”一文中提出“第三空间”这一新概念。季增民认为大量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是介于市民与农民之间的“第三群体”，并由于这一群体大多居住在城乡接合部，中国的城乡地域结构实质上已演化为三元结构，即在城市（第一空间）、乡村（第二空间）之外，存在着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空间（城乡结合部）。作者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遥感、GIS等技术手段对无锡和昆山的第三空间进行了界定，然后通过五年以上景观和问卷定点调查，多层次、多方位地揭示本地农民、外来人口（农民工/迁入市民）社会群体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投影在第三空间的轨迹。我认为这篇文章的意义不仅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更在于对一个地点长期的微观的调查对理解中国近三十多年城乡社会和空间格局的变动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其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城市体系研究方面有以下几篇文章值得介绍。首先是李健和屠启宇的关于世界城市体系研究的论文。世界城市研究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其后萨森以全球城市命名那些在世界经济中起指挥和控制作用的城市。萨森特别强调金融资本在全球城市功能中的作用，更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英文缩写为FIRE）作为评价城市等级的指标。追随萨森的研究思路，英国拉夫堡大学的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组（GaWC）以生产者服务业的全球联系为指标，开创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新领域。李健和屠启宇的文章认为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主的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无论是老牌世界城市，还是崛起中的新兴世界城市，都需要规划新的发展路线图。文章认为，世界经济正进入创新竞争的阶段，创新与创意成为驱动城市发展的最核心动力。因此，作者以GaWC和2Thinknow相关的研究成

果为基础,结合既有世界城市排名与创新城市指数排名构建了新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那些具有丰富人力资源,从而具有强大创新力的城市其排名有大幅度的上升。文章的结论是我国的世界城市必须重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打造集现代服务与先进制造业于一身的综合型世界城市,以制造业发展集聚人力基础,推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王曙光(WANG Shuguang)和张永昶(ZHANG Yongchang)的论文从零售地理学的角度对中国城市的市场等级体系进行了建构。文章首先通过计量方法把中国 287 个城市分成五种市场等级,其次探讨了不同跨国大型零售商在中国城市中的区位选择特点及与城市等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章为中国零售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框架。

城市网络分析代表了城市体系研究的新趋势,而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基于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赵新正和宁越敏的论文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的空间分布数据对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变化进行了研究。论文得出两大结论:一是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城市网络呈现出以北京、上海两个世界城市为双中心,并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全球城市一区域为核心,以沿海和区域中心城市为重点的空间特征;二是经济全球化使长三角城市网络体系形成两个层级,核心网络由原来的沪宁杭转变为上海、苏州和宁波三者,次级核心网络由以上三个城市与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和南京等其他城市共同组成。

中国的对外开放以 1979 年设立深圳特区为标志。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深圳已成为我国新兴的重要经济中心。而在深圳的成长过程中,深圳与香港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沈建法的论文回顾了深圳与香港经济关系的演变,认为虽然深港之间存在相互竞争,但自香港 1997 年回归后两者之间的合作正在成为主流,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在城市规划和治理上的合作。

另外,汤庆园和徐伟的论文探讨了外来女性劳动力对地方经济的影响,而褚劲凤、黄辉和钟韵等人的文章分别从创意产业园区、城市旅游空间等角度研究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化,也值得一读。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带来了城市化的现象。城市化在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各种城市问题与城市化进程如影相随,甚至产生严重的病症。正如 19 世纪英国伟大的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昧的年代”。21 世纪是城市的世纪。2010 年,上海举办了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世博会,这在世博会历史上是首次,表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我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任重而道远,对此,我们需要积极应对,通过政策、规划、管理、新理念、新技术,以及建立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积极

预防和治理各种城市问题，以促进中国城市化持续健康地发展。

## 注释

-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1。
-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  
[http://www.ce.cn/macro/more/201103/16/t20110316\\_22304698\\_10.shtml](http://www.ce.cn/macro/more/201103/16/t20110316_22304698_10.shtml)。